



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

SELECTED WORKS OF THE CHINA
NATIONAL FUND FOR SOCIAL SCIENCES

内蒙古通史 第一卷

远古至唐代的内蒙古地区 (二)

总 主 编 郝维民 齐木德道尔吉
本卷主编 张久和

 人 民 出 版 社



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

SELECTED WORKS OF THE CHINA
NATIONAL FUND FOR SOCIAL SCIENCES

内蒙古通史 第一卷

远古至唐代的内蒙古地区 (二)

总 主 编 郝维民 齐木德道尔吉
本卷主编 张久和

 人 民 出 版 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学术著作系列
TOMUS 23

第三编

专 题

第七章

石器至青铜时代内蒙古与周边地区的交流

经过几代考古学者的努力工作，内蒙古地区石器至青铜时代的文化遗存有了许多发现。经过研究，总的讲这一时期内蒙古地区的诸种考古学文化，有的有本地区特点，有的呈现出与周边地区文化交流的态势和内涵。

第一节 发端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区分野

内蒙古地区自旧石器时代起，就有既具特色、又与周边同期文化有联系交流的考古学文化遗存。中石器时代特别是新石器时代以来，内蒙古高原上各种考古学文化类型与周边地区的影响和交流愈加频繁和紧密，在接受和传承的同时，仍保有着自己的地域文化特色。

一、旧石器时代的文化态势

内蒙古地区目前发现最早的旧石器时代遗存，为呼和浩特市东郊大窑遗址四道沟地点的石器制造场，起始年代大约距今七八十万年左右。在全国范围内的同类遗址中均极为罕见的是，该石器制造场的文化层堆积从旧石器时代早期起，历经旧石器时代中期，一直延续至距今约 1.2 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①。早期和中期的遗存，除四道沟外，遗址内的其他地点尚无发

^① 汪英华：《大窑遗址四道沟地点年代测定及文化分期》，《内蒙古文物考古》2002 年第 1 期。

现；到晚期，同类遗存不仅广布于整个大窑遗址3平方公里多的范围内，而且在周围大青山主脉和支脉的山坡上也发现了多个石器制造场遗址，如呼和浩特市榆林镇前乃莫板村脑包梁、保合少乡南水泉村附近和卓资县哈达图乡火石窑沟等^①。大窑遗址从旧石器时代早期至晚期的打制石器制造传统保持了一定的延续性，如以大型石器为主，但存在变小的趋势，器物组合以刮削器占主要地位，砍砸器次之，尖状器不发达，其中龟背形刮削器是最富特色的器物。

距今约5万—3.7万年的河套人及其所创造的萨拉乌苏文化，是在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发现的一处与大窑遗址的石器制造传统截然不同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类型。萨拉乌苏遗址的石器器类有柱状石核、刮削器、钻具、尖状器和雕刻器等，其显著特点是器形非常细小，多数仅长2—3厘米，宽1厘米左右，重量在1—2克左右的数量最多^②。

对于以大窑遗址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为代表的大窑文化和萨拉乌苏文化两种不同的石器制造传统的解释，往往与整个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文化的两个系统学说联系在一起。自20世纪70年代初，有的学者认为华北地区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开始，即存在着两个文化系统，二者以不同的石器制造传统相区别，分别为匭河—丁村系（又称大石片砍砸器—三棱大尖状器传统）和周口店第一地点—峙峪系（又称船头状刮削器—雕刻器传统）。前者的基本特征是利用宽大石片制造各种类型的大砍砸器和三棱大尖状器等，小型石器不多，类型也简单，属于这个系统的遗址主要分布在晋、陕、豫三省的交界地区。后者的基本特征是利用不规则的小石片制造小石器，遗址分布甚广，包括河北、山西、陕西三省的北部和宁夏、内蒙古、辽宁三省区的南部。大窑遗址与萨拉乌苏遗址惯常分别被纳入前、后两个系统之中。萨拉乌苏遗址的文化内涵与山西朔县峙峪遗址十分接近，且时代大致相当，被认为是周口店第一地点—峙峪系向西分布、发展的文化遗存^③。至于大窑遗址

① 内蒙古博物馆、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呼和浩特市东郊旧石器时代石器制造场发掘报告》，《文物》1977年第5期；汪宇平：《内蒙古阴山地带的石器制造场》，《内蒙古文物考古》1981年创刊号。

② 王幼平：《中国远古人类文化的起源》，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0—161页。

③ 李壮伟、石金鸣：《华北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相互关系》，《史前研究》1985年第1期。

确实能否归属前一系统,尚存诸多疑点,如遗址远离该系统的传统分布区,却与后一系统交织在一起,也没有发现匠河—丁村系的典型器之一三棱大尖状器。

随着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不断深入,两系统说日渐显示出诸多难以自圆其说之弊,开始受到不同程度的质疑。但两种不同的石器制造工艺的客观存在,至少反映了一定地区内文化间的联系与交流。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大窑文化与华北地区其他的一些旧石器时代文化互有影响,同时有着自己独具的文化传统。

西部地区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发现有乌拉特后旗艾力克铁不克、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镇东北 30 公里和 35 公里处的贺兰山西麓 89 地点、91 地点等 3 处遗址^①,它们在文化面貌与石器制作技术上均较为接近,其中以贺兰山西麓 91 地点的材料较为丰富。91 地点的石器均采用直接打击法加工而成,个别石器的第二步加工使用了较为特别的软锤技术,器形有砍砸器、刮削器、端刮器和凹缺刮器等,以刮削器数量最多。89 地点的石器器形与 91 地点相近,只是在技术上有所进步,使用了压剥技术,时代较后者稍晚,二者间可能存在传承关系。

在内蒙古东南部和东北部地区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有翁牛特旗上窑村北的老虎山洞穴遗址、东乌珠穆沁旗金斯太洞穴遗址和满洲里市扎赉诺尔区的蘑菇山遗址^②。老虎山洞穴遗址发现的打制石器有大型的砍砸器和小型的刮削器,伴出肿骨鹿化石,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金斯太洞穴遗址经过两次正式发掘,洞内的文化层堆积被划分为三层,中层属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下层可能更早。下层出土石器较原始,有尖状器、砍砸器、石砧和石核等,主要伴出野马化石;中层出土石器以小型者居多,大型的较少,

① 戴尔俭、盖培、黄慰文:《阿拉善沙漠中的打制石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64 年第 4 期;李壮伟:《内蒙古阿拉善左旗发现原始文化遗存》,《考古》1992 年第 5 期;李壮伟、王爽:《贺兰山西麓的旧石器》,《考古与文物》1994 年第 2 期。

② 景爱:《沙漠考古通论》,紫禁城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84 页;魏坚、王晓琨:《东乌旗金斯太旧石器时代及商时期洞穴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02),文物出版社 2003 年版;汪宇平:《扎赉诺尔蘑菇山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 1 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62—71 页。

器类有尖状器、砍砸器、雕刻器、石核和细石器类的石叶、刮削器等，伴出的动物群包括野马、披毛犀、鹿、野牛、转角羚羊、鬣狗、旱獭和骆驼等。蘑菇山遗址的石器器形偏大，主要器类有石锤、刮削器、尖状器和砍砸器等，其中刮削器又分凸刃、直刃、凹刃、两边刃、端刃等多种，自身特色鲜明；但其中石锤的大量出现、锤击加工石器法的广泛应用、用交互打击法对刮削器进行加工、尖状器和砍砸器在生产和生活中不占主要地位等特点，又与大窑文化具有一定相似性。

对于内蒙古境内发现的这些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与我国西北地区、华北地区、东北地区乃至整个蒙古高原的旧石器时代遗存之间的关系，目前尚缺乏足够的资料予以较为明确的认识。这些遗址的分布，西起贺兰山西麓，经河套平原、阴山山脉，一直北延至中蒙边境草原和东北地区，无疑对此后内蒙古地区古代文化传统的形成与分化具有重要的影响。

二、细石器传统的起源与发展

在距今大约 1.2 万年左右，地质年代进入全新世，中国的史前文化也开始步入中石器时代。在秦岭—淮河一线以北，这一时期的文化遗存普遍以盛行细石器为主要特征。

细石器以间接打击法所剥离的细石核、细石叶以及用细石叶加工的石器为代表，一般是为了装备骨、木等复合工具而专门制作的石刃，习惯上往往把与它们共存的用石片制作的小型石器，如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镞等石制品，以及大型的砍砸器也都包括在内。自旧石器时代晚期以来，由于狩猎技术的进步而导致的对复合工具的需求，使石器小型化的趋势在全世界范围内普遍出现，从而奠定了细石器产生的基础。欧洲、西亚、北非和澳洲等地的细石器以几何形（三角形、半月形、梯形、菱形）为特征，而亚洲东北部和美洲西北部则多细石叶细石器，形成不同的文化传统。

我国华北地区是细石叶细石器工艺传统的起源地，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已逐渐向小型化发展，特别是河南安阳小南海、峙峪和萨拉乌苏等遗址出土的若干石器，已具备了细石器的雏形。此后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细石器的分布愈加广泛，扩展至周边广大地区，东北穿越白令海峡抵于北美洲，西

南越喜马拉雅山脉到达印度境内^①。

大窑遗址南梁沟地点 1976 年发掘的探方 2T5 表土层，出土的刮削器、尖状器和锥状石核等石器，器形较小，打击技术进步，具有细石器的特征。金斯太洞穴遗址中层出土的石器，以小型者居多，并出现了典型的细石器。由此可见，大窑和金斯太两个遗址在由旧石器时代晚期向中石器时代的过渡上具有一定的延续性，丰富了我国华北地区细石器传统起源的理论。此外，鄂伦春自治旗嘎仙洞遗址探沟第 3 层遗存和海拉尔区松山、科尔沁右翼中旗嘎查、察右中旗大义发泉、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城南等遗址^②，也都被定位于大约中石器时代之际。这些遗址，大部分与华北地区和蒙新高原的同时期遗存具有较多共同的特点，如以细石器为主，扁体和圆体的细石核共存，船底形石核数量较多，细石叶较普遍，不见磨制石器和陶器等。

中石器时代是作为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之间的过渡形态提出的，其经济生活仍以狩猎、采集和捕捞为主。农业的产生是我国北方大部和南方共同进入新石器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这一经济活动方式的重大转变大约发生在距今 1 万年以前。由于自然地理环境的不同，形成了三个巨大的经济文化区，即华中、华南的水田稻作农业经济文化区，华北和东北南部的旱地粟作农业经济文化区，东北北部、蒙新高原和青藏高原的狩猎采集经济文化区。在新石器时代，华北地区的细石器传统由于农业的兴起而走向衰落，生产工具以磨制石器为主，偶尔可见个别的细石器。而东北北部、蒙新高原和青藏高原，由于气候寒冷干燥而难于发展农业，经济上仍不得不以狩猎和采集为主，故石器传统仍然继承中石器时代的模式，以细石器为主，只是在技术上更加成熟进步，陶器和磨制石器虽已出现，但始终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

① 安志敏：《中国细石器发现一百年》，《考古》2000 年第 5 期。

② 呼伦贝尔盟文物管理站：《鄂伦春自治旗嘎仙洞遗址 1980 年清理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 2 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444—452 页；安志敏：《海拉尔的中石器遗存——兼论细石器的起源和传统》，《考古学报》1978 年第 3 期；吉林省文物工作队：《内蒙古科尔沁右翼中旗嘎查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考古》1983 年第 8 期；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察右中旗大义发泉村细石器文化遗址调查和试掘》，《考古》1975 年第 1 期；李壮伟：《内蒙古巴彦浩特的细石器》，《考古》1993 年第 4 期。

三、文化区的划分

始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三大经济文化区，在考古学区系类型理论的指导下，还可以划分为许多较小的文化区。南方水田稻作农业经济文化区和北方旱地粟作农业经济文化区，大致可再分为六个文化区，分别为江浙文化区、长江中游区、山东文化区、中原文化区、甘青文化区和燕辽文化区。东北北部、蒙新高原和青藏高原的狩猎采集经济文化区，以前被笼统地称为细石器文化，实际上它们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地域差别，相信以后随着对这些遗存研究的不断深入，有进一步细分的可能。这些文化区通常可与我国古史传说中各部落集团的活动区域相对应，实际上是一种民族文化区的萌芽。它们既呈现出多样性的发展格局，又以在一定范围内的联系而具有某些共同因素，并始终以中原文化区为核心，从而形成了中国早期文明起源多元一体的格局，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可以说奠定了以汉族为主体、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石^①。

内蒙古境内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大体上分属于中原文化区、燕辽文化区和狩猎采集经济文化区的一部分。在这些文化区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和受周边文化影响的不同，还可以分出一些小的亚文化区。当然无论是文化区还是亚文化区，其分布范围并非是一成不变的，不同的时期会有所变化，可能一个时期某种考古学文化的分布范围会超出一个文化区的范围之外，或者也可能发生邻近文化区的某种文化深入到此区的现象，关键是需要依据各个考古学文化的具体分布区域来确定。内蒙古地区的情况亦是如此，考古学上惯用的“内蒙古中南部”、“内蒙古东南部”和“内蒙古北部草原地区”等地理学名词，并不能够完全代表该区域考古学文化的实际分布范围，而要与周边省区联系起来通盘考虑。

内蒙古中南部位于黄河一曲之处，属于中原文化区“北方地区”亚区的一部分，其中又可分为西部的河套与鄂尔多斯黄河两岸小区、东部的岱海—黄旗海—商都小区。北方地区的地理范围，大体西以包头—靖边、南以甘泉—灵石、东以五台山、北以阴山山脉为界，包括内蒙古中南部、晋中

^① 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文物》1987年第3期。

北、冀西北和陕北等地区。内蒙古东南部是指以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为中心的地区，行政上包括赤峰市全境和通辽市的大部，属于燕辽文化区“辽西区”亚区的一部分。燕辽文化区至少包括了燕山南麓区（简称燕南区）、辽西区、下辽河区和辽东半岛区等几个亚文化区，其中后二者又往往与辽西区相对应被合称为辽东地区。辽西区的范围，东、西分别以医巫闾山和七老图山为界，北至西拉木伦河两侧，包括西拉木伦河、老哈河、大凌河、小凌河及它们的支流地区。区内以东北—西南走向的努鲁尔虎山为界，分为东、西两个小区，内蒙古东南部位于努鲁尔虎山以西小区，并占据了其大部。内蒙古北部草原地区包括了东起呼伦贝尔市大兴安岭西麓、南达阴山北麓、西至阿拉善盟的广大内蒙古高原地带，属于狩猎采集经济文化区的一部分，其中可能包含了多个不同的考古学文化类型。

考察内蒙古地区战国以远诸考古学文化与周边地区的交流，首先要明确一个时期的文化或文化类型在文化区或亚文化区内的分布范围、所处地位以及内蒙古境内的田野考古工作和谱系研究状况，然后才能够进一步探讨其与周边甚至更远地区考古学文化的交流情形。与内蒙古相关的北方地区和辽西区两个亚文化区，从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一直到早期铁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发展脉络，均各自基本上长期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状态，因此可以作为直至战国时期的对外文化交流研究的基础。

第二节 内蒙古中南部诸考古学文化与周边地区的交流

分布于内蒙古中南部的新石器时代至战国时期的考古学文化，按照时代先后的顺序，主要有仰韶文化的几个地方类型^①、龙山时代的老虎山文化、青铜时代早期的朱开沟文化、殷商中晚期的西岔文化和东周时期以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为代表的诸文化类型。这些时代有先后之别、内涵各具特色的诸文化类型，均与周边同类文化有深浅不一、或疏或密的交流。

^① 韩建业：《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77—126 页。

一、仰韶文化诸地方类型

仰韶文化是约公元前 5000 年至公元前 2500 年之间主要分布于黄河中游地区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文化，它来源于本地区更早的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和老官台文化等，钵、壶（瓶）、盆、罐和瓮是该文化最稳定的陶器器类组合。以公元前 3500 年为界，仰韶文化分为前、后两期，前、后两期中又各分两期，总共为四期。

仰韶一期遗存的年代约在公元前 5000 年至公元前 4200 年之间，是仰韶文化初步形成的时期，出现了许多不同的地方类型，约以公元前 4800 年为界分为早、晚两段。目前在整个北方地区尚没有发现该文化的早段遗存，内蒙古中南部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也是从晚段开始讨论的。晚段遗址不多，在岱海小区和鄂尔多斯小区之间还存在一些差别，分属于主要分布于豫北、河北大部的后岗类型和鄂尔多斯、晋中一带的鲁家坡类型。

岱海小区遗存以石虎山 I 和 II 遗址为代表^①，陶器主要分夹砂褐陶和泥质红陶两类，前者占主要地位，夹砂陶早段尚素面晚段多绳纹，泥质陶始终素面和压光，主要陶器器类有红顶钵、红顶盆、釜、釜形鼎、壶等，鼎的足部多压窝加固或穿孔。石虎山 II 遗存与属于后岗类型早段的北京房山区镇江营一期晚段遗存非常相似，推测前者是后者一类遗存所代表的居民向西扩展的结果。石虎山 I 遗存由 II 遗存发展而来，期间与后岗类型其他小区相互交流，并受到半坡类型的较大影响，出现了一些新的文化因素，如在夹砂罐上遍拍绳纹，新出折唇高直颈壶、折唇球腹壶等。在后岗类型中，石虎山 I、II 遗存自始至终流行釜，缺乏彩陶，较多地保留了早段遗存的特色，可以划作后岗类型之下的石虎山亚型。

鄂尔多斯小区以准格尔旗鲁家坡遗址第一期文化遗存、官地遗址第一期文化遗存为代表^②，陶质陶色与石虎山亚型大同小异，陶器器类主要有绳纹

①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日本京都中国考古学研究会岱海地区考察队：《石虎山遗址发掘报告》，《岱海考古（二）——中日岱海地区考察研究报告集》，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8—145 页。

②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准格尔旗鲁家坡遗址》，《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 2 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20—136 页；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准格尔旗官地遗址》，《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 2 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85—119 页。

(旋纹)敛口罐、绳纹(旋纹)敛口瓮、红顶钵、素面钵、素面盆、折唇球腹壶、贴加乳丁装饰的大口尖底罐、小口罐、盆形甑等。鲁家坡类型的重要特色是多旋纹盆,这在仰韶一期遗存的其他类型中是少见甚至不见的。它的来源,应该是半坡类型和后岗类型等扩展至此并融合的产物,半坡类型也通过鲁家坡类型一直影响到了石虎山亚型,可以说是由于半坡类型和后岗类型在内蒙古中南部和晋中一带的势力角逐而形成了鲁家坡类型。鲁家坡类型中个别有肩石锄的形制,与辽西区大约同时的赵宝沟文化、富河文化的同类器相近^①,或许表明它们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

仰韶二期遗存的年代约在公元前4200年至公元前3500年之间,是仰韶文化大发展的时期,各地方类型间的共同因素大为加强,并对外部的其他原始文化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内蒙古中南部的仰韶二期遗存可分为早、中、晚三段,在早段与晋中共同形成了王墓山下类型,到中段该类型的分布范围进一步扩大,包括了冀西北、晋北和商都地区。王墓山下类型地域不断扩大的过程,也正是仰韶二期遗存以文化面貌趋于统一为发展主流的反映。

王墓山下类型早段遗存以凉城县王墓山坡下遗址早期遗存、清水河县白泥窑子遗址C点F1为代表^②,基本陶器器类有钵、环形口小口尖底瓶、宽带黑彩钵、卷沿鼓腹盆、侈口罐、绳纹敛口瓮、火种炉等(图一)。夹砂陶多饰细绳纹和旋纹,泥质陶多饰黑彩花纹,是半坡类型对本地区仰韶一期遗存强烈影响的产物。东、西部之间仍存微小差异,如鄂尔多斯小区的假圈足碗未见于岱海小区。

王墓山下类型中段遗存以王墓山坡下遗址晚期遗存、鲁家坡第二期文化遗存为代表,主要陶器器类有环形口小口尖底瓶、葫芦口瓶、黑彩窄带钵、卷沿曲腹盆、侈口罐、绳纹或素面敛口瓮、绳纹或素面敛口盆等。这一时期晋南豫西的庙底沟类型对外强势扩张,仰韶文化空前统一,王墓山下类型中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敖汉赵宝沟——新石器时代聚落》,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174页;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巴林左旗富河沟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4年第1期。

②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聚落演变与早期文明》课题组编:《岱海考古(三)——仰韶文化遗址发掘报告集》,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149页;崔璇、斯琴:《内蒙古清水河白泥窑子C、J点发掘简报》,《考古》1988年第2期。

段遗存在主要继承早段遗存的基础上，保持了与周围地区，尤其是与庙底沟类型的交流。文化类型内部之间的一些地方差异还是存在的，如岱海地区开始出现红彩、紫彩，新见鳞纹图案；东北边缘的商都县章毛勿素遗址彩陶盆曲腹不显，花纹僵硬，还存在红顶钵等^①。此时的仰韶文化对辽西区的红山文化产生了积极影响，花瓣纹等仰韶文化因素从华山脚下出发，经由晋南、内蒙古中南部、河北与红山文化联系了起来，而内蒙古中南部地区也出现了一些红山文化的因素，如岱海地区的鳞纹等。

王墓山下类型晚段遗存发现较少，基本陶器器类在延续中段遗存的基础上，内部开始出现地区性分化，这也与整个仰韶文化由合而分的总体发展趋势是相一致的。鄂尔多斯小区以白泥窑子 A 点 F2、准格尔旗白草塔遗址 F25 等遗存为代表^②，出现少量的砂质陶，绳纹罐由侈口变为翻缘或卷沿，新出现大口尖底瓶、圈足或假圈足盆。岱海小区以凉城县红台坡上 G1 为代表的遗存变化最大^③，新因素占据了主流地位，小口突腹瓮、直口折腹钵、直口筒形罐等器形与大量复彩图案的出现，已无法把它继续归入王墓山下类型，实际上标志着一个新的文化类型开始出现了。

仰韶三期遗存的年代约在公元前 3500 年至公元前 3000 年之间，仰韶文化内部发生分化，地方类型间的差异增大，受外界影响显著，表明整体文化开始走向衰退。在北方地区，可划分出两个地方类型，即内蒙古中南部的海生不浪类型和晋中的义井类型。海生不浪类型完全分布于内蒙古中南部，而且由于这一时期仰韶文化地方类型的突出化，许多学者倾向于把此类遗存视为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出现的第一个独立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这实际上反映了如何看待仰韶后期遗存内部分化的问题。

海生不浪类型以托克托县海生不浪遗址和察右前旗庙子沟遗址为代

①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乌兰察布博物馆、商都县文物管理所：《商都县章毛勿素遗址》，《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 2 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37—150 页。

②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考古研究室：《清水河县白泥窑子遗址 A 点发掘报告》，《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 2 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91—210 页；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准格尔旗白草塔遗址》，《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 1 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83—204 页。

③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聚落演变与早期文明》课题组编：《岱海考古（三）——仰韶文化遗址发掘报告集》，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88—193 页。

表^①，典型陶器器类有侈沿夹砂罐、直口缸、敛口瓮、筒形罐、小口双耳罐、喇叭口尖底瓶、钵和侈口罐等（图二），夹砂陶大部分饰绳纹，泥质陶有的装饰彩陶。海生不浪类型是在本地仰韶二期遗存的基础上，吸收了大量的外来文化因素而形成的，以来自北方地区以东同时期遗存的影响最大。深折腹钵来自豫北冀南的大司空类型，筒形罐和彩陶中的相对双勾纹、鳞纹、三角形纹、棋盘格纹等来自红山文化，小口双耳罐和彩陶中的对顶三角纹、对顶菱纹、折线三角纹等来自燕南区的午方类型和辽西区的小河沿文化，其中小口双耳罐的变化只是将直领圆肩的特征改造为斜领鼓腹而已。由于受周边文化影响程度的不同，海生不浪类型内部可分为东、西两个亚型，如东部庙子沟亚型的曲腹盆、偏口壶、漏斗、斜腹碗等器形与西部阿善二期亚型的喇叭口尖底瓶不互见，阿善二期亚型依稀可见来自甘肃东部石岭下类型的影响。

仰韶四期遗存的年代约在公元前 3000 年至公元前 2500 年之间，仰韶文化原有的许多文化因素日渐衰落和消失，新的文化因素不断滋长，因此也有人把它看做是仰韶文化和龙山时代之间的一个过渡时代。在北方地区，岱海小区、晋北和冀西北普遍缺失这一时期的遗存，鄂尔多斯小区和陕北形成了阿善三期类型，晋中有白燕类型。

阿善三期类型以包头市阿善遗址第三期文化遗存、准格尔旗寨子塔遗址第一阶段文化遗存为代表^②，主要陶器器类有篮纹鼓肩或折肩罐、敛口瓮、大口瓮、小口瓮、高领罐、素面侈口罐、绳纹罐、直壁缸、喇叭口或浅杯形小口尖底瓶、小口壶、折腹盆、斜腹盆、弧腹盆、敛口曲腹钵、深折腹钵、平底碗、深腹豆、钵形甑、小单耳罐、小双耳罐、杯和器盖等，陶质多为纯正灰色，可见少量彩陶。该类遗存的陶器器形较多，大多与海生不浪类型的陶器存在演变继承关系，部分源自外来影响，如单、双耳罐来自关中地区的泉护二期类型，广肩高领罐的出现与来自晋南豫西的庙底沟二期类型的影响

① 北京大学考古系、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呼和浩特市文物事业管理处：《内蒙古托克托县海生不浪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研究》（三），科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96—239 页；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庙子沟与大坝沟——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上、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535 页。

②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蒙古史研究所、包头市文物管理所：《内蒙古包头市阿善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4 年第 2 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准格尔旗寨子塔遗址》，《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 2 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80—326 页。

有关，少数矮圈足双腹盘也是晋南豫西和关中一带流行的器物。阿善三期类型内部的地方差异较为明显，可区分出三个亚型，即南流黄河两岸（包括陕北北部）的寨子塔亚型，包头市东部、大青山南麓一线的阿善亚型，陕北南部的小官道亚型。寨子塔亚型流行在小口瓮颈部、肩部以下饰一周压印纹，深折腹盆折棱处饰一或二周压印纹，篮纹罐、绳纹罐等少数有花边。阿善亚型流行连点戳印纹（或刺纹），石刀常在中部划磨出长条形凹槽后再在中部穿孔。与此时的整个仰韶文化区普遍发生的情形一样，阿善三期类型的主要变化趋势是，绳纹减少，篮纹迅速增加，彩陶大幅度减少，仰韶文化已接近了尾声，龙山时代诸文化类型则开始启奏了它们的序曲。

二、老虎山文化

大约公元前 2500 年至公元前 1900 年之间，原仰韶文化分布区及其周围山东、江汉和甘青等地区进入了龙山时代。龙山时代的文化面貌具有轮制陶器的盛行和器表颜色的黑、灰化等共性，表明在一个更广大的范围内文化遗存间的统一性增强了；但另一方面，各地方遗存间又表现出相当的地方性，这是从仰韶后期开始的地方类型间长期分化的必然结果。北方地区的龙山时代遗存主要是在本地仰韶四期遗存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部分地区显示出极强的共性，虽仍与中原文化区保持了较亲密的联系，但自身特色显露无遗，形成了独立的老虎山文化^①。与其他龙山时代遗存一样，老虎山文化的陶器群相当庞大，有斝式鬲、甗、盂、大口折肩尊、敛口瓮、大口瓮、直壁缸、绳纹或篮纹鼓腹罐、高领罐、斜腹盆、曲腹盆、敛口钵、平底碗、浅腹豆、甑、单耳罐、双耳罐和小斝等，器物种类之多达到了一个最高峰，其中斝式鬲、甗和盂构成老虎山文化最典型的器物组合（图三）。

老虎山文化以约公元前 2200 年为界，分为前、后两期。依据一些地区间的差别，前、后两期各可划分为三个地方类型。前期的地方类型有岱海地区以凉城县老虎山、园子沟等遗址为代表的老虎山类型^②，鄂尔多斯南流黄

^① 韩建业：《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43 页。

^②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岱海考古（一）——老虎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集》，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0—392 页。